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

史锦秀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

史锦秀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史锦秀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9

(文艺学丛书)

ISBN 978 - 7 - 202 - 04650 - 0

I. 艾... II. 史... III. 艾特玛托夫—文学研究
IV. 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1340 号

书 名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

著 者 史锦秀

责任编辑 段 颢

封面设计 耿 斐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编:050061)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2 00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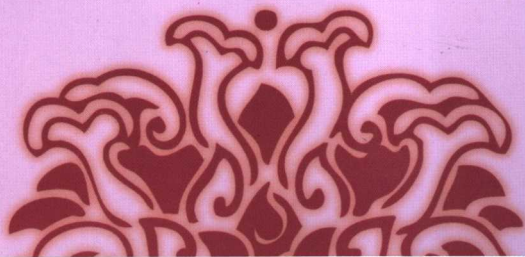
印 数 1 - 1 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04650 - 0/G · 1517

定 价 27.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史锦秀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俄苏文学的研究。合作出版专著《河北解放区作家论》，作为主编出版《外国文学阅读与欣赏》、《世界文学》（上、下册）、《外国名著提要》等4部教材，作为副主编出版《世界文学历程》（上、下册）等4部教材。在《外国文学研究》、《俄罗斯文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责任编辑 段 鲲
封面设计 耿 柴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序.....	(1)
绪论 比较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视域.....	(3)
第一节 进入跨文化视域.....	(3)
第二节 艾特玛托夫——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6)
第一章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13)
第一节 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与背景.....	(13)
一、中吉交往源远流长.....	(14)
二、中吉文化的亲缘关系.....	(17)
三、中国与俄苏文学的互识与互补关系.....	(24)
第二节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30)
一、“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译介情况	(30)
二、“文革”后至苏联解体前的译介情况	(31)
三、苏联解体后的译介情况.....	(39)
第三节 译介与传播的特点.....	(44)
第二章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的研究.....	(49)
第一节 艾特玛托夫生平思想研究.....	(50)
一、对艾特玛托夫的评价.....	(50)
二、艾特玛托夫思想研究.....	(57)
三、艾特玛托夫生平思想研究的特点.....	(72)
第二节 艾特玛托夫创作研究.....	(73)
一、对艾特玛托夫文学理论的研究.....	(75)

目 录

• 2 •



序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他是前苏联当代著名的吉尔吉斯族作家，现为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作为一个在文化血缘上与中国有联系的作家，他对中国的一些当代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前对他的评论和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是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研究，探讨艾特玛托夫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的影响的跨文化文学研究的专著尚属空白。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的作者史锦秀教授正是在这一点上，以原创性的思路、翔实的资料、科学的分析，将艾特玛托夫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的崭新领域，其艰难可想，其勇气可嘉，其努力可奖。我认识史锦秀教授是很早的事情了。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们就作为朋友共同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的工作而奋斗了。多年来，她一直在所供职的高校担任文学院副院长，繁杂的教学管理工作并未妨碍她在教学、科研上的积极拼搏。2004 年，身为教授的她考取了天津师范大学，从我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她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刻苦攻读，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撰写博士论文。她的精神实在是让我感动不已，我以有她这样永葆学术青春的学生和朋友感到自豪。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是一本跨文化文学研究的专著，是作者



勇攀学术高峰的成果。她依靠自己较好的中文和俄文功底，选择了这样一个对文献资料要求很高的选题。她辨析了大量的资料，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入手，将艾特玛托夫与中国的文学关系放在宽广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对国内的艾特玛托夫研究进行了系统评述，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对他的民族接受和作家对他的个人接受，既有开拓性，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在对艾特玛托夫与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张炜、路遥、高建群、意西泽仁等的比较研究中，合理地选取了“民间立场与人民形象”、“大地——母亲情结”、“追求理想的人道主义”、“执着于信仰与宗教精神”等角度，准确地勾勒出了艾特玛托夫在中国被接受的历史脉络以及他对中国文学的重大影响，完成了自己学术研究上的又一次跨越。

史锦秀教授的《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的研究，是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中一个较好的实例，这为此后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这一学术领域展开研究是一个极富难度的工作，因为就影响和接受的双方而言，都涉及多种文化的复杂因素，对这些文化因素的结构研究及其在文学交流中的相互作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作为她的朋友，我为她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作为她的导师，我预祝她在这一领域里取得更大的成就。

孟昭毅

2007年盛夏于攻玉斋



绪论 比较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视域

“不同的文学植根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所以要使我们的论述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就不能局限于历史上某个世纪或某次运动。”

——厄尔·迈纳^①

第一节 进入跨文化视域

人类文化的历史表明，每一种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多元文化的相互接触、影响和互补中进行的，这就是文化的多元共生、多元共存的道理。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②从古至今，人类文化的进步都是在跨文化语境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中完成的。

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不断吸收、融合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的结果。从秦汉时代开始，中国文化就同中亚和西亚等外域文化有了交流。汉代以后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得到迅速发展。隋唐时代，中外文化交流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伊斯兰教、景教、祆教

也相继传入。这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形成一种‘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大好局面。在吸取外来文化过程中，又根据自己的民族需要进行选择取舍，加工改造，因而更加增强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④从明清到20世纪初，中国文化面对的是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欧洲文化。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对中国的文化输入带有强制的性质。而这种带有强制因素的文化交流反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面改造。新文化时期，异域作家（尤其是俄苏作家）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成为文化交流的主潮，异域文化与外国作家作品开始成为中国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以开放的姿态迎来了与世界文化广泛交流的大潮，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开始译介到中国，中外文学研究、中外作家比较研究、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一些跨文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命题，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学界比较文学研究关注的课题。

在中国，一些前辈学者在跨文化文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冯雪峰的《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文学的影响》、钱钟书的《通感》、《论林纾的翻译》、《管锥编》、季羨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曹未风的《鲁迅与外国文学》、王元化的《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杨宪益的《译余偶拾——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新衣故事、〈酉阳杂俎〉里的灰姑娘、唐代新罗长人故事》、方平的《曹雪芹与莎士比亚》、张隆溪的《也谈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乐黛云的《“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等论著，为中国的跨文化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比较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专著和论文。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唐弢的《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王佐良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戈宝权的《普希金与中国》、孙乃修的《屠格涅夫与中国》、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智量等著的《俄国文学与中国》、阿英的《易卜生作





品在中国》、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郁龙余的《中印文学关系史》、孟昭毅的《东方文学交流史》、《古希腊戏剧与中国》、刘海平的《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在国外》、叶舒宪的《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汪介之的《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何乃英主编的《东方文学概论》等。1996年，昆仑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由季羨林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大型系列丛书。这是一项迎接21世纪东方文化复兴的世界性文化工程，其中涉及到许多跨文化文学研究的课题，迄今已陆续出版了80多种。21世纪初，跨文化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吴泽霖的《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乐黛云的《跨文化之桥》、陈建华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等相继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套《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钱林森著）、《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王晓平著）、《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郁龙余著）、《丝路驿花——阿拉伯波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孟昭毅著）、《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汪介之、陈建华著）、《异域的召唤——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卫茂平著）、《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张弘著）、《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葛桂录著）、《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刘顺利著）等。这套跨文化丛书对中外文学关系双向阐释和跨文化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新的飞跃，同时也为跨文化文学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启示。

钱钟书先生曾明确指出：“从历史上看来，各国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④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属于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既涉及外国作家怎样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如何在接受中构想和重塑中国形象，又涉及外国经典作家和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以及中国作家在本国文化语境中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和对自身文化的更新。这类研究不是

单向的影响或接受研究，而是影响与接受并重，注重文学交往中双向互动的现象。目前，我国关于艾特玛托夫及其创作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关于他在中国的影响，关于中国对他的民族接受和作家对他的个人接受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其中涉及到的一些中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和影响研究，还有需要填补的空白。本书将努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弥补这一研究领域中某些环节的不足。

“文学的民族接受问题，实质是一个文学史的问题。”^①本书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对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影响进行梳理。采用文学的文化批评方法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新时期文化背景，探讨艾特玛托夫的文学影响和中国当代作家的个性接受，以及造成这种文学影响和接受的文化因素，进而探究异质文化在相互交流过程中所表现的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此外，本书的努力还希望被视为这样一种尝试：对文学及其功用的再理解。

第二节 艾特玛托夫——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艾特玛托夫，钦吉兹·托列库洛维奇（Айтматов, Чингиз Торекулович, 1928—）是原苏联著名的吉尔吉斯族作家，现为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是位双语作家，用吉尔吉斯语和俄语写作。他童年时期生活在祖母家，习惯于吉尔吉斯人传统的游牧生活。他的父母皆毕业于俄语学校，父亲早在十月革命时就是党务工作者，1937年成为“大清洗”的受害者。艾特玛托夫在两种语言环境中成长，1948年毕业于畜牧技术学校，1953年毕业于农学院，后在畜牧研究所工作3年。自1952年起，艾特玛托夫在地方刊物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1956—1958年就读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高级文学讲习班，嗣后任《文学吉尔吉斯斯坦》杂志编辑，在伏龙芝（现名比什凯克）任记者。1957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面对面》，





在莫斯科杂志上开始占一席之地。1958年中篇小说《查密莉雅》的发表给他带来广泛的国际声誉。1959年，艾特玛托夫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年小说集《群山和草原的故事》（1962）获列宁奖金。1967年起他担任《新世界》和《文学报》编委。1968年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1966）获苏联国家文学奖。中篇小说《白轮船》（1970）改编成同名电影后，1976年获第9届全苏电影节大奖，其电影剧本获1977年苏联国家文学奖。1978年艾特玛托夫被授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81年作为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六次代表大会。1982—1984年，艾特玛托夫出版了3卷本文集。1983年他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1980）获苏联国家文学奖，被誉为80年代苏联文学的“指路牌”和“方向标”。1984年他被授予民族友谊勋章，1986年当选为作家协会理事会常务书记。“改革”期间，艾特玛托夫发表长篇小说《断头台》（1986）。同年，苏联《图书评论报》依据民意测验选出的该年最佳的四部作品中，《断头台》名列榜首。1988—1990年艾特玛托夫出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1990年3月艾特玛托夫被任命为苏联总统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出任苏联驻卢森堡大使（至1994年）。这期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雪地圣母》的某些章节。苏联解体以后，艾特玛托夫选择了吉尔吉斯共和国为他的国籍，当选吉尔吉斯作家协会名誉主席。1993年底吉尔吉斯总统任命他为该国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洲共同体和北约的代表，后担任吉尔吉斯驻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大使兼驻北约和欧共体的代表。1994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卡桑德拉印记》，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在前苏联当代作家中，艾特玛托夫的出现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他身上存在着很多双重的和多重的东西：他是使用吉尔吉斯语和俄语写作的双语作家；他的创作吸收了吉尔吉斯、俄罗斯和其他异族文化及文学传统；他同时肩负着民族的、国家的和世界的多重文化使命。这使艾特玛托夫的创作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他说：“文学就是我的生命。”他把创作看成是“义不容辞的



天职”和崇高的责任，看做一个知识分子对人民、对民族、对后代理应肩负的心灵上的责任。早在大学期间，他就非常希望在吉尔吉斯出现一些富有感染力的、辉煌的作品，这种创作激情和文学的使命意识一直贯穿于他的创作中。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艾特玛托夫多次表明自己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民族文学发展的见解，认为“每个作家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与土地相连的连接点”。^⑥对于他来说，这个连接点就是故乡舍克尔，它通过艺术家的心灵，为全人类所共有。因为总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被认为具有全人类性质的。他认为每一种当代苏联民族文学都有两个起源：一个是本民族的传统，一个是俄罗斯文化的传统，应该“从两种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拜倒在两种民族文化的源泉面前”。^⑦同时，他非常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认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生活和他们的世界观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可以帮助作家走向广阔的全人类的天地。他认为“真正的创新的基础是把民族积累的精神财富，同全苏联和世界艺术宝库中的最高成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⑧他这种文化视野和全球观念，是推动他日后走向世界的强大动力。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立足民间、为人民写作的作家，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很有胆识的作家。他认为作家是自己时代的良心，作家要对读者负责，对当代生活负责。“文学应该勇敢地肩负起自己艰难的使命——要干预复杂的生活，以及使人认识和喜爱自身、他人身上和社会上的全部善良的、美好的、受到尊敬的东西，并为此而操心不息。”^⑨他站在人类意识的高度，对当前有关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生价值和人类命运等重大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体现了他对人类和世界的终极关怀。他努力宣扬人类人道主义思想，执着于理想与信仰的层面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在思想与哲学的层面探求世界的救世良方。他关注社会现实，敢于鞭挞罪恶，抨击时政，评价历史，在作品中大胆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从《白轮船》开始，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引起强烈的反响。《白轮船》以小男孩的不是“没有出路的结局”打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不能反



映悲剧的神话。《花狗崖》以神话、传说、象征、梦幻等手法表现“爱”的主题，从而确定了苏联当代散文中的假定性艺术。《一日长于百年》以“在探索哲理和美学上取得的成就”，“打破了苏联文学长期以来稳定和规范的法则”，^⑩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开创了“全球性思维”这一重大的历史命题，被誉为 80 年代苏联文学的“路标”之作。1986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断头台》是一部多主题、多线索的大容量作品，作家直指苏联文坛无人敢涉及的禁区——吸毒和贩毒问题，毫不隐讳地暴露了苏联社会的阴暗面和最敏感的部位。作品引起很大争议，毁誉不一，最后还是获得了文坛和读者的认可，其社会价值及艺术成就毋庸置疑。艾特玛托夫最终以一颗寻求真理和体现人类愿望的艺术良心征服了苏联和世界。

艾特玛托夫执著于小说艺术的开拓与创新。他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又广泛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既坚持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方向，又大胆“摒弃一切过时的东西，而用当前的经验取而代之”。^⑪在俄文版的《艾特玛托夫文集》第 3 卷中，选取了他近 30 年的创作经验总结，里面涉及到很多文学理论和艺术技巧问题。其中关于文学观、文学的本质及社会功用、文学创作的艺术思维和艺术真实、文学发展中的历史继承性、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等问题，艾特玛托夫都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他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他说，“我反对那样的理论家，他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构成僵死的、永久不变的、完整的系统。不，我们的艺术方法是处在经常的运动和发展之中的，它经常从相邻的方法和风格中汲取许多养分。”^⑫他总是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不停地探索和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他的早期作品质朴、淳美、清新，不拘一格。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的创作，从单纯的现实主义传统转向多元化，运用了假定性形式、象征艺术、时空交错、多重线索等现代主义手法。80 年代以后，他开始用“星球思维”来探讨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问题，以多主题、多层次、多线索的较短篇幅，表



现纷繁而宏大的主题内容，具有了“小型化史诗”的综合性倾向。他将现实主义手法与象征、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相融合，将史诗性、哲理性汇入整一的艺术境界，显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文化相融合的趋势。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洋溢着东方古老的吉尔吉斯民族的异域情调，渗透着这个民族对世界的独特认识和感受，同时也反映了在生态破坏、核战争危险、道德沦落等生存困境面前，对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人的价值和命运等永恒主题的关注。他敢于面对现实生活，面对复杂的社会，面对整个世界，并诉诸于深深的审美思考与艺术追求。艾特玛托夫就是这样怀着作家那颗“自己时代的良心”，带着“星球思维”的热望，“真正做到了面向自己的民族、面向自己的国家、面向整个人类的生存世界。”^⑩

作为一个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才有了书面文字的吉尔吉斯少数民族作家，艾特玛托夫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创作不但强烈地影响了俄语文学界，而且受到了国际文坛的高度重视。继肖洛霍夫之后，1983 年他被遴选为全欧科学、艺术、文学研究院院士。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被法国作家阿拉贡称为“描写爱情的空前杰作”。《白轮船》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赢得了世界声誉，法国评论界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我们承认，我们看不到当今有哪一种西方文学能向我们提供像《白轮船》那样水平的作品。”^⑪他在德国和日本家喻户晓，备受青睐。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7 年的统计数字，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已被译成 127 种文字，在 130 多家外国出版社出版发行，语言种数及印数都居世界各国作家的前列。甚至一个只有 4 万多人的民族——萨阿米人，几年前也用萨阿米语出版了他的小说。他不但在前苏联国内多次获奖，在国际上，他还获得意大利“橄榄枝”奖、德国“吕克特”奖、奥地利国家文学奖等重大奖项。他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在前苏联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在世界文坛都是罕见的。1998 年 5 月，他作为贵宾和“全世界的著名作家”应邀出席了在基什尼奥夫举行的“争取和平文化和反对战争文化”的代表大会。1999 年 2 月 22 日，联合国